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

与媒介批评研究

QINGMOMINCHUZHISHIFENZI
YUMEIJIEPIPINGYANJU

胡丹 著



通过了解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及其思想，我们发现，新兴知识分子职业的、理性的反思与批评精神，“言论救国”的爱国情怀，维护新闻自由的执着与坚定，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兼容开放、独立进取、守望正义的媒介批评优良传统，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值得当代媒介批评者学习、继承与发扬。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家|出|版|社|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
与媒介批评研究

QINGMOMINCHUZHISHIFENZI
YUMEIJIEPIPINGYANJIU

胡丹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 / 胡丹著. —南昌 :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210-06780-1

I . ①清… II . ①胡… III . ①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民国
②传播媒介 - 批评 - 研究 - 中国 IV . ①D693.71 ②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8287 号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

作 者：胡 丹 著

责任编辑：陈才艳

封面设计：游 珑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11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8.25

字 数：200 千

ISBN 978-7-210-06780-1

赣版权登字—01—2014—65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35.00 元

承 印 厂：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中国媒介批评的发生学研究成果

中国大陆学界 1995 年明确提出“媒介批评”概念以来，转眼就快二十年了。近二十年来，专家学者不断提出媒介批评的研究课题，陆续发表与出版各自的研究成果；专业期刊开辟媒介批评专栏，发表媒介批评文章，探讨媒介批评学理；新闻传播院系开设媒介批评课程，招收媒介批评研究生，编写媒介批评教材。所有这一切，使媒介批评逐渐成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

然而，媒介批评的一些基本学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譬如，关于媒介批评的起源，富有学理性的研究就不多见。有一种观点颇为流行，说“媒介批评与媒介同时诞生”，媒介批评与媒介实践始终相伴相随，有如“并蒂莲”一般。但是，这种论断至少包含了两个基本的学术问题：一是媒介何时产生？这“媒介”是指古代媒介还是现代媒介？二是媒介批评究竟是与媒介一同产生？还是媒介产生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媒介批评？从理论上说，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媒介批评的发生学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什么是发生学？新闻传播学界很少关注，不妨略作介绍。

发生学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生物科学研究动植物的发生发育和演化问题的科学。在词源学上，“发生学”源自生物学领域的“遗传学”，英文为 genetics，是指由英国生物学家 W. 贝特逊 (W. Bateson) 1906 年根据希腊语“繁殖”(generatione)一词正式命名的一门学科。在语义学上，发生学是指 17 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胚胎学，它主要探讨生物学领域动植物的发生发育和演化问题。遗传学、胚胎学及发育生物学，都是探讨生物包括人的发生发育过程，它们是现代生物学的基础。^①

尽管发生学产生于自然科学领域，但是也迅速进入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并成为其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对史学的重要影响在于，它使史学家认识到研究起源的重要性”。^②随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法的历史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历史学派等。19 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学的世纪，人类社会的起源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历史学家的目的不再是研究历史教训的世界主义哲学家的目的，而是要研究起源、联系和发展”。^③这样，发生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得以采用。

所谓发生学方法，就是对历史事物的起源、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的一种方法；研究特点是把某一研究对象从初始状态中分离出来，对其发展的每个阶段进行动态分析，并且对每个历史阶段和过程中形成的状态的主要的、本质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历史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趋势。^④

在历史研究中，发生学方法是回溯式研究方法与前瞻式叙述方法的有机统一。回溯式研究方法的步骤是：历史完成的结果即现实是研究的起点，通过对现实本质的认识和把握，找到其本质要素和条件的规定性。由此进一步追溯这些要素和条件的早期历史形式，以及这些早期历史形式相互作用的整体发展过程。然

^① 张乃和. 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 史学集刊, 2007(7).

^② 孙秉莹. 欧洲近代史学史.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374.

^③ 科佩尔·S. 平森. 德国近现代史(上册).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71.

^④ 王海军. 发生学方法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6).

而,这一研究过程诉诸表述时,叙述形式就不再是这样逆向的回溯顺序,而是从早期历史形式出发,通过复杂的演变而发展到现实的正向历史过程。这就是前瞻式的叙述方法,实质上这是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和解释。^①

按马克思对发生学方法的阐述,就是“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值得注意的是,发生学或发生学方法中所谓的“发生”具有相当丰富的意涵。在语义上,“发生”有养育、长成、形成、生就等多个含义。在学术意义上,“发生作为新质的生成,是在过去的发展所创造的一定前提的基础上实现的,它是把一定的前提加以同化和改造,使之成为新的整体、新的相互作用体系的过程”。^③“在唯物史观中,‘发生’这一范畴本身的内涵比形式逻辑所要求的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依据唯物史观以时间为轴心来探究的任何现象的形成过程,便是这个轴心每个点上的职能。”^④

按发生学方法,对于媒介批评起源的研究,其实是媒介批评形成以后对媒介批评起源问题的回溯式研究。在这里,上文提及的两个前提性问题必须加以澄清。

其一,媒介何时产生?这“媒介”是指古代媒介还是现代媒介?作为现代性语境下展开的话题,这里说的媒介是现代媒介,不是古代媒介。古代媒介(主要是古代报刊)产生以后,也有一鳞半爪的批评,或许还有比较完整的批评文字。譬如,向为新闻史家所乐道的宋人周麟之《论禁小报》一文,就是主旨鲜明且论述完

^① 张乃和.发生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史学集刊,2007(5).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24.

^③ 夫·弗·康斯坦丁诺夫.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44.

^④ M.A.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29.

整的批评文字。不过在古代中国,像这样完整的媒介批评文字并不多见,单文孤证,不足为训。更为重要的是,古代报纸究竟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在学术上是有争议的。20世纪80年代初,方汉奇先生断言敦煌文书“进奏院状”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在新闻界引发轰动,后来的新闻史著作基本上采取这一说法。不过,这一判断并非没有异议。1986年,隋唐史专家张国刚教授撰文论证,“开元杂报”是政府公告而不是邸报,与古代的报纸完全不相涉;唐代“进奏院状”只是公函,不是报纸,将其视为最早的报纸或报刊的滥觞,是不相宜的。^①遗憾的是,张国刚教授的论断并未引起新闻史研究者应有的重视。纵然承认古代报纸是报纸,它与现代报纸也判然有别。因此,探讨媒介批评的起源,还是宜将视野聚焦到现代媒介(首先是现代报刊)产生以来的历史阶段。

其二,媒介批评究竟是与媒介一同产生?还是媒介产生之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媒介批评?我以为,作为对媒介的是非、得失、美丑进行反思、分析、评论的媒介批评,理应是媒介产生以后并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就中国现代媒介的发展历史而言,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文商业报纸如《申报》、文人论政报纸如《循环日报》相继创办,中国现代报刊的特质才充分彰显出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媒介批评也应是这以后才逐渐产生。在这之前肇始于1815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外国人在华办报实践,并未产生相应的媒介批评实践。我曾将媒介批评区分为“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与“媒介批评的学术研究”两个基本方面^②(这个表述颇为拗口,也可以更简洁地表述为“媒介批评实践”与“媒介批评研究”),又曾指出媒介批评应区分为“自发的媒介批评”与“自觉的媒介批评”两个历史阶段。^③如果说“媒介批评研究”(也即“媒介批评理论”)开始于1995年明确提出“媒介批评”概念之后,那么,“媒介批评实践”(或曰“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主要“生成”

^① 张国刚.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论“邸报”非古代报纸.学术月刊,1986(7).

^② 董天策.搭建学术平台,促进媒介批评.中外媒介批评第1辑卷首语.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

^③ 唐金凤.加强媒介批评,促进传媒发展,深化新闻学术——访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今传媒,2011(3).

于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时期,集中体现在维新变法时期(1895—1898)、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1917—1927)几个时段。

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指出,“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①因此,与其寻找一个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起源的标志,不如从实际出发,明确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生”在清末民初这一时期。这样,或许可以得出更加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然而,这样一种认识是需要证明的。如何证明?要知道,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起源也好,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也罢,研究对象不是现存的,而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因此,本着发生学方法,必须尽量全面地搜集各种相关的史料,并通过对这些相关史料的研究,来揭示其“发生”的具体样态与历史因由。

胡丹博士的专著《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媒介批评起源的发生学研究成果。

首先要充分肯定的是,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专著几乎是作者凭借自己独立搜集的第一手材料写成的。作者查阅了19世纪70年代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申报》、《大公报》、《新民丛报》、《时务报》、《清议报》、《国民日报》、《向导》周报、“竖三民”、《热血日报》、《清华周刊》、《北京大学日刊》、《甲寅杂志》、《东方杂志》、《晨报副镌》、《新青年》、《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现代评论》、《解放与改造》、《人民周刊》等60余种报刊,从中辑录出大量的媒介批评文本。书中附录列出的篇目有八九百篇,直接引用的篇目近三百篇,其扎实的史料功夫可见一斑。

其次,在掌握扎实文本资料的基础上,作者综合运用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资源,着重分析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阐释现代知识分子媒介批评意识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演变进程,全面揭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在孕育时期、萌芽时期、自觉意识初步兴起时期的历史演变轨迹,从而探讨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过程”,史论结合,点面结合,立体化呈现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学研究成果。无论是与此前出版的媒介批评理论的研究专著相比,还是与此

^① 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7.

前出版的媒介批评历史的研究专著相比,《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都具有独到的创新意义与学术价值。

胡丹与我有师生之谊,先是跟随我读硕士,后又跟随我读博士。这部颇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就是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坦率说,2009年底胡丹和我商讨选择“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这一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我既感到高兴,又不免担心。高兴的是,她知难而进,富有探索的勇气和决心。担心的是,她没有历史学科背景,缺乏史学训练,能否有效发掘第一手史料,能否顺利消化第一手史料,都令我为她捏一把汗。最终,胡丹硬是凭借自己的艰辛努力,啃下这一块硬骨头,在2012年顺利完成博士学业,而且还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现实关怀与职业意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

当然,由于作者的文史功底与理论素养尚有待进一步提升,《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譬如,书中说“首次尝试以原始文献资料及严谨的逻辑推理来考证‘现代媒介批评的发生’这样一个学理问题”,这一表述意味着作者要采取发生学的视野与方法,但是全书并未论及发生学与发生学方法。又如,全书史料扎实,但理论阐述与理论分析,尤其是对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实践与现代传媒业、与现代知识分子、与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之内在关系的论述,主要还是一种描述性论述,学理性分析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好在作者还很年轻,相信胡丹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知识的积累,理论性阐释不足的问题,在她今后的著作中一定会得到圆满的解决。

是为序。



于重庆大学新闻学院

2014年10月25日

目录

1	绪论
25	第一章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生态
25	一、清末民初：千年未有之变局
29	二、从传统走向现代：清末民初知识分子思想的变迁
43	三、清末民初的媒介生态
51	第二章 清末民初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发生过程
51	一、维新变法前后：媒介批评的孕育时期
64	二、辛亥革命前后：媒介批评的萌芽时期
88	三、五四时期：媒介批评的“职业自觉”
145	第三章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代表人物
145	一、报业先驱彭翼仲：开风气之先
150	二、梁启超：步入理性思考
153	三、于右任：从感性诤言转向理性批评
160	四、胡适：谨慎、务实的批评思维
168	五、鲁迅：自觉的战斗意识
173	六、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
185	七、戈公振：学者的批评思维
192	八、何心冷：报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196	九、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批评观

201	十、瞿秋白：“红色”批评家
205	第四章 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理性审视
205	一、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特征
211	二、清末民初媒介批评的进步作用
215	三、清末民初媒介批评的时代局限
217	结语
221	参考文献
235	附录
278	后记

绪论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学界对“媒介批评”的研究渐趋全面、深入,大陆学者受其影响,也开始关注该领域,引入台湾学者黄新生的著作《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1995年,吴迪在刊物《现代传播》第5期发表大陆第一篇以“媒介批评”为主题的文章,“媒介批评”概念逐渐为中国大陆学者所接受。2001年,刘建明教授正式出版中国大陆第一本媒介批评著作——《媒介批评通论》,奠定了深入、系统研究媒介批评理论的基础。从此,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研究逐步走向专业化、系统化。

十余年来,“媒介批评”的学术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首先,“媒介批评”基础理论得到了初步建构,研究者围绕“媒介批评”的起源、概念、主体、对象、理论方法、标准等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将“媒介批评”构建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其次,“媒介批评”历史研究初步得到展开。2007年,刘建明教授出版了中国大陆第一部“媒介批评史”著作《西方媒介批评史》,

之后,学术界又相继出产了几本媒介批评史专著,分别是《中国电视批评史》(欧阳宏生、杨状振著)、《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胡正强著)、《中国媒介批评史》(刘建明等著)、《鲁迅: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开拓者》(宋双峰著)。

“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活动也相应得到开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业界出现不少批评媒介的文章,《新闻记者》、《今传媒》、《新闻界》杂志中的“媒介批评”专栏不仅是“媒介批评”学术交流的平台,同时也是“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主阵地”,^①批评者对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媒介文化等领域展开批评。与此同时,“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开始崭露头角,《妖魔化与媒体轰炸》(李希光著)、《解密中国电视》(张锦力著)、《告别弱智:点击中国电视》(李幸著)、《第三只眼看传媒:媒介批评热点文选》(王君超著)等著作先后出版。由此表明,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蓬勃发展、媒体数量的剧增,媒体干预社会生活的程度愈来愈深,民众对媒体的反思行为也将愈来愈常见。

“媒介批评”学术研究与话语实践发展的良好态势,使不少国内学者认为,我国“媒介批评学”建构时机已然成熟,甚至有学者进一步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学”。^②然而,作为一个尚属新兴的研究领域,“媒介批评”的基础理论体系并不完善。这是因为,一方面,学界对于“媒介批评”领域一些基本、核心理论问题没有达成共识,众学者之间的分歧仍比较大;另一方面,学术界鲜见相关论著对我国媒介批评发展史进行全面而系统地梳理、总结与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媒介批评”成为重要学科的可能性,并大大弱化了其对新闻传播学科和社会实践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在当前新闻传播史、媒介批评史论著当中,媒介批评活动的发展史总是与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纠缠”一处。可以说,媒介批评发展史并未被脉络清晰地、科学地、系统地独立出来,这就给媒介批评的学理建构与话语实践造成了很大困扰。

^① 李滨、钟沈军.媒介批评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影像[J].今传媒,2009(1).

^② 学者雷跃捷、王君超论著《媒介批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中,分别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媒介批评学观点,学术界亦有部分文章对此表示支持。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媒介批评”领域的学术研究还需得到更深层次拓展,需要继续完善“媒介批评”的学理建构,并且深入探索“媒介批评”历史发展的沿革。

二、研究目的

本书旨在根据第一手文献资料,通过梳理、剖析、论证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这个时段知识分子发生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考察清末民初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揭示出我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本质特征与发展规律。

选择“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时期进行研究,是因为:第一,现代报业、出版业的兴起,为媒介批评话语实践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共平台。

现代报业兴起之前,历代统治者对社会舆论管控相当严格,而清廷对舆论与媒介的限禁尤甚从前,在这样的媒介生态环境中,以文本形式发生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就非常稀少。清末民初时期,社会政局动荡,各种势力兴起,限禁政策因此有所放松,在此背景下,现代报业、出版业得以兴起,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三次办报高潮,大量报刊得以问世:1865 至 1895 年,全国新办了中文报刊 86 种,外文报刊 91 种;^① 1895 年至民国初年,又诞生了七八百种中文报刊;从 1917 年至 1921 年间,全国新出版的报刊在 1000 种以上,其中,大约有四五百种新文化报刊诞生,报纸副刊与文学杂志大量出现;出版物的种类也在不断扩展,包括教科书、小说、报纸、杂志、丛书及各类专业性的书籍,新闻学著作也得以问世。这就为自由、独立言论的发表,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公共平台,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恰恰是自由、独立言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是现代媒介批评发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清末民初这段时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大转折时期,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他们不但参与时政变革的议论,对现实充满关怀;同时积极利用报刊实现自我职业意识的认同。

^① 李倬宇、钱培荣. 晚清报刊的发展历程[J]. 杭州大学学报, 1996(12).

面对现代报业发展初期的种种不足、封建报刊的反扑以及清廷、各届军阀政府对报刊报人的压迫等种种现实,新兴知识分子急欲寻求公共平台发出批评的声音,他们具有现代科技知识、自主开放意识、强烈的现实关怀与职业责任意识。

由于军阀政权更替频繁,在社会失范的环境下,言论自由反而相对松弛,这就使得新兴知识分子有机会发表独立言论,张扬思想个性,对报刊等媒介进行批评,由此萌起了现代媒介批评的话语实践。知识分子也成为推动现代媒介批评发生发展的主要力量。

为什么需要考察清末民初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发生、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清末民初时期知识分子的媒介批评特点十分特殊,这体现在:

第一,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初步显现学理性与自觉意识,部分批评话语甚至能够从社会学、伦理学、新闻传播学的专业视角对媒介展开批评,如:徐宝璜《新闻学》、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等新闻学著作中,出现了具有学理色彩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新青年》、《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新潮》、《热血日报》、《觉悟》等刊物,相继开辟出冠以“书报评论”、“新刊批评”、“书报批评”等作为名称的、相对固定的批评专栏;《新闻学周刊》、《新闻周刊》、《平民大学新闻系级刊》、《新闻学刊》、《报学月刊》等学术期刊也发表了不少批评媒介的学术论文。这些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已经初步具有自觉批评意识。

第二,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具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清末民初时期,挽救民族危亡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目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著书立说,创立报刊,以此宣传政治主张,并对社会现实、媒介现实表达不满意见,这种批评的直接目的,只为做“政治的凹凸镜”^①。因此,许多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第三,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十分感性、零散,甚至是不成体系。清末民初时期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有些批评内容仅仅是知识分子思想的火花闪现、职业责任感的流露;同时,知识分子展开媒介批评的实践方式、文本体裁十分多样化。从实践

^① 鲁迅、瞿秋白.萧伯纳在上海[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3.

方式上看,胡适对报刊捏造新闻事实的现象,多次采取“读者来信”的形式在报刊公开进行批评;梁启超、邵飘萍、戈公振等人则撰写“学术性文章”进行批评;鲁迅则是个很特殊的个案,他对媒介进行批评,喜爱采取杂文进行“隐而微”的感性批判而非显性的学理性批评;从批评文本体裁上看,论说、评论、言说、公开信、杂文、报刊发刊词,都是批评的体裁,媒介批评的文本体裁呈现多元化特征。

以上这些或“显性”或“隐性”,或“理性”或“感性”的批评话语,需要我们仔细去判断,否则,就容易将之与文学批评混为一谈。

正如学者指出的,“媒介批评经历了从口头批评到文字批评到系统理论化批评的发展过程”^①,带学理色彩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固然是媒介批评史深入研究的对象,但应该看到,感性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也折射出我国现代媒介批评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历史发展脉络。因此,区分它们,研究它们,十分有必要。

论从史出,史论研究必须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才具有可靠性,遵循此规律,笔者尽力查阅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不仅梳理清末民初带有学理色彩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而且梳理清末民初感性、零散且不成体系的媒介批评话语实践,从而有效地为当代媒介批评实践提供历史性理论依据,并从中剖析现代媒介批评传统对当代媒介批评实践的影响。

三、研究现状

国内学术界对媒介批评史的专项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并不丰硕,从属性上看,大致有以下几类:

第一,媒介批评史专著。目前,我国学术界仅有几部媒介批评史专著,分别是《西方媒介批评史》(刘建明,2007年),《中国媒介批评史》(刘建明,2011年),《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胡正强,2009年),《中国电视批评史》(欧阳宏生,2010年)。

^① 雷跃捷. 媒介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7.